



汤显祖

编年
评传

黄芝冈著 吴启文校订

黄芝冈著 吴启文校订

汤显祖

编年评传

中国戏剧出版社

汤显祖编年评传

黄芸冈著

吴启文校订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95千字 13.25印张 2插页

1992年8月第1版 -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册

ISBN 7-104-00308-8/K·26

新登(京)字第150号

定价: 7.60元



作者像

王名風溪四百年丹青寫尚好
 前清汪倫俠通玄經樂死明燈藉此傳
 昨川先生出家巨擘其心勢傳高芳家
 佛國情文相生昔人評為佳俠仙佛能
 言參乎天人國不假文書之美齊容之
 威北湖真生年宿時嘉靖庚戌為五元
 一五元零迄八一九零容應四言前而
 德清翁平伯題畫齋書



若士先生小像
 道光戊戌初夏江都陳作霖敬摹



汤显祖画像

目 录

导 言 1

汤显祖编年评传 40

导 言

一九五六年六月里，我到了江西临川，在抚州专署新建房屋二楼住宿，可望见临川近郊景色。这时候正值江西雨季，四望葱翠，使人想到汤显祖诗“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玉茗堂诗·二京归觉临川城小》）的句子。我所到的地方是这位诗人和戏曲家的故乡，是景色清幽的江西地方。刘继庄在《广陵杂记》里称道江西风土，说“江西山水树木有超然远举之致”，可以“洗涤尘秽，开拓心胸”。在汤显祖的故乡，我初次感到他这些话亲切有味。因此，我对于这地方就深为爱慕，一直到今天写这篇序文的时候。

玉茗堂街离专署不远，我首先见到了街旁的“汤家玉茗堂”碑。我寻见汤显祖的故居是在雨晴散步的时候，不经意的遇合，真使我如获奇珍。碑立在一家住宅门的右方，立碑的时间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立碑的人自署“西蜀居士”。玉茗堂原是汤显祖沙井新居里面的一所建筑。新居落成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新居的地址在沙井巷里，沙井巷离玉茗堂街不远，可推知立碑地方也就在沙井新居附近。只是新居落成离立碑的时间已有二百七十多年，那时候的玉茗堂是汤家设宴演戏的地方，从汤显祖生前到他死后，都经常能听到堂上的笙歌。直到清·顺治二

年(1645)，揭重熙、曾亨应等在临川起义抗清，被清兵围困三月，当时近城民居都被焚毁，几十里外都被清兵掳掠。等到城破以后，清兵在城里驻防，汤显祖的沙井新居就被毁了。直到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陆辂任抚州通判以后，汤寅祖的儿子汤秀琦才借助汤斌的力量，收回了他伯父的这所住宅，并由陆辂重加兴建，作为汤显祖的祠堂，汤家玉茗堂就从此再建成了。据说新堂落成，陆辂大会地方官吏，并由昆班在堂上演出了汤显祖的剧作《还魂记》，也可知这所新堂仍和往日规模一样^①，这时候离立碑的时间也还有一百七十九年。再经过一些变迁，新堂只剩了旧址，清末的临川人也忘怀了这新堂了。立碑的是一位四川人，和汤显祖非亲非故，但因为和杜丽娘认做同乡，他却让汤家玉茗堂在它的旧址上留下这一点痕迹。这可算《还魂记》的最后一个掌故，也可说汤显祖剧作的精神不死。

在一个落雨的天气，和抚州市人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洗净了这块碑，并拍了两张照片。街道居民对这件事情感到有些奇怪，都来看热闹了。市委会的一位同志对街道居民进行了宣传，并托他们对这件文物加以保护，因此就延长了这块碑的寿命。据街道居民说，他们正倡议修沟，这块碑将取作铺街石了。有一位老年居民谈到他少年时的见闻。据他说：“碑的前面原是一大唐，塘的前面原是一大坪，现在的马路就穿这大坪而过，可见清光绪时，这所遗址并不象今天这样局促。”

① 顺治二年清兵陷抚州，据《明史·曾亨应传》、《抚州府志》卷二十《兵卫志》。汤斌和汤秀琦联宗，据《临川县志》卷四十九之四《艺文》，汤秀琦《碧涧草》汤斌《序》。陆辂就玉茗堂遗址建祠演戏，据焦循《剧说》卷六，康熙甲戌重刻《玉茗堂全集》汤秀琦《序》。

由市委会的同志介绍了傅再希老先生。由傅先生的引导，凭吊了汤显祖的坟墓。汤墓在文昌桥(现名解放桥)下太平街十七号怡茂隆烟号屋后的小块隙地里面，墓地却早已平了，只剩下一块短碑和碑旁的两条石柱。这墓碑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立的新碑，立碑人是权知临川县事江召棠，他在两条石柱上面题写了“文章超海内，品节冠临川”两句话。江字云卿，桐城人。曾任江西上高、临川等县知县，在临川县的任内曾修建汤显祖墓。后来调任南昌县知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昌教案起，江召棠被法教士包围在老贡院的天主教堂里面，逼勒他释放教民，枉杀百姓，江力争不屈，被教士用刀杀死。第二天，激起了老百姓的一场暴动，将这所教堂烧了，并杀死了几名英、法教士^①。江召棠是一位很有骨气的官，因此，就修墓立碑的人说，这墓碑和石柱也应当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物。

这地方原来是灵芝园，现在叫汤家山，又叫灵芝山，是汤家祖墓所在地，也就是汤显祖出生的地方。这地方原葬有许多坟墓，当抗战的时候，日本兵在这里挖战壕，把这些坟墓都铲平了。汤墓的得以保存，是因为烟店老板用竹篱把墓地圈入自己家里，想作为他自己的私有土地，并用这块土地做他晒烟叶的场所，用汤墓石碑磨他切烟叶的刀。由于他这一点自私的心，汤显祖的墓地和这块墓碑反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在墓碑的右上角却平白地增添了磨烟刀的一处缺痕。我们问烟店的人，他们的回答干脆只一句话，说“这都是解放前的事情”，也就将毁损的一切责任全推开了。

在汤墓的右方西首是汤家祠堂的遗址，墓地左方东首有一藕塘，据说塘里藕种比别地藕种多一眼，别地藕种七眼、九眼，但

^①据六修《南昌县志》卷七七《官师》。

这塘里藕种却有八眼、十眼，因为藕种好，藕味也就很甜，可算是一种特产。这一带地方原名汤家村，在汤显祖的沙井新居还不曾兴建以前，原是他父亲一辈聚族而居的地方。

但现在汤家的族人却散居在临川各地，和江西人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相反。他们散居的地点有西津场（出西城八里）、榆坊场（出西城三十多里）、桐源圩（出西城四、五十里）、云山场（出东城靠北四十五里）、丁村场（出东城）、湖口岗、白水场（已绝）、杨铁坑、杨铁坊、杨州坊各处地方。我曾在辟火焦汤钵子家、下璜村汤锦桂家借到两部文昌汤氏宗谱，方知汤家族人散居临川还不止以上所举的这些地方。

现在汤家的族人都是农民。据说清乾、嘉以后，汤家族里曾出了两位登仕郎；嘉、道以后，汤家族里出了一位武秀才。这说法虽不尽可靠，但汤族的人世代务农，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却是一个事实。

汤家族人散居各地和清初临川兵乱的关系很深，同时汤显祖的儿子又是复社朋友，汤季云毁去他甲申以后所做的诗，更应当和清初文字狱深有关系。可知从南明到清初一段时间，汤家子弟和族人曾饱受逃亡痛苦和政治黑暗的威胁。

因此，汤族的人对他家的这位祖先——汤显祖的印象一直就很淡薄。这情况在清·嘉庆五年（1800）稍前就已经开始。破额山人的《夜航船》，是这个时候刊行的书，书里写到他的朋友严又茗曾到临川访问汤的后人，和这位汤的后人引起一场齟齬的事。他在这书里说：

亡友严又茗，明代至今五百余年，其所辨香而心注者唯一汤若士，颜其堂曰：“又茗”。有荐之南昌幕中，主人调抚州，遂访临川汤氏后裔。得一副贡生，其人胡须满颊，腐气

触人。又茗曰：“久仰玉茗先生清风亮节，不识玉茗全集外，还有几种遗书否？”其人曰：“客误矣。豫铭堂稿乃敝徒邵某所刻，仆为之批阅。尊驾所问玉茗堂集，舍下无书名，去问坊肆可耳。”又茗大哭。其家以为不吉，阖起一堂，几被诟骂。

南庐叔替这书作跋，认为这件事情并非“虚妄”。这时候，汤后人读书的还不知他家里有这样一位祖先，农家子弟就更不用提了。这事情并不是一件笑谈，却是件使人闷损的事。因此，我在这次访问回来，就认为对这位诗人和戏曲家的一生事迹有详尽加以搜集、介绍并进行研究、评论的必要。

汤显祖的家庭是一个衣食丰足的读书人家，在当时江西地主早已进行土地兼并的社会情况下，他产生在这个开明的中小地主家庭里面。因此，他在二十九岁以前是一位不事劳动，不惯拘束；不大谙练世故，性情孤介，善爱高谈阔论，却又是一位长厚、质实、有洁癖和正义感的读书人。就在这个时候，他刻印了他的诗集《问棘堂邮草》。他的少年知友谢廷谅在这书的序言里，将这时候的汤显祖形象地刻出个轮廓来了。谢在《汤临川问棘堂邮草·叙》里说：

君气亮盖世，而常共于匹夫。长安长者多所知名，而州大夫或无半面。乡人有不能得其片字，而四方有识传宝其书。语帝王大略，激昂万乘，而不能说丘巷。足不识城府远路，而好谈天下厄塞。料人物数千里之外，而常为眉目小儿所给。发策周历，谳冥律气，而手不能差量币物。娶妇十年矣，而袖无半钱。恶恶道至甚，而闻盗贼之死亦悲。幻提贵达，而石友无聊之士。僭而务分，人克后房，而居常不内反。拒绝人地，而好观名山川，寻师服食。此予有所解，有所未解也。

谢廷谅解不开汤显祖性情上、生活上、思想上的许多矛盾，因归结为“有所解，有所未解”，却不知生活在这许多矛盾里面是每一个封建统治下的开明知识分子都不能独免的事。汤显祖对乡绅地主（乡人）、地方官吏（州大夫）不肯随和；不爱和有名位的人们（贵达）交往，却爱和不得志的读书人（无聊之士）交好朋友；习惯过老百姓（匹夫）的朴素生活；对遭受压迫和敢于反抗压迫的老百姓（盗贼）寄与同情；看不起私人财产，时常没有钱用，也时常分钱给人；却都是他的好处。只是他对日常生活不肯留心，不能和老百姓在生活上打成一片；他的学问不从日用实践中来，因此流于空虚、理想——走向唯心超世的路；他时常谈一些帝王大略，兵家形势，只是他在放言高论里面，却同时蕴藏了一个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用世思想；他看不惯乡绅地主、地方官吏，更看不惯贵达的人们，但又想在仕途上一显身手，或是想遗弃世缘，走他的高蹈的路。就由于他的用世思想和他对社会的不满，使他在这两条路上摇摆不定，但他却想不到有第三条可走的路。这一些却都是他的时代和他的阶级成分所给予他的限制，他自然无法解脱。

汤显祖从出生到十三岁，是权相严嵩执政的时候。从十八岁到三十三岁，是权相张居正执政的时候。严嵩和张居正是明代最有实权的两个宰相。当严嵩执政的时候，民间已经非常穷困，但他却威权独揽，贿赂公行，替明朝封建统治腐蚀、崩溃的悲惨命运扎了个深的根子。张居正原是个经济长才，只是他的施政却是以初明的独裁政治为目标的。他不知明太祖当时的种种措施，到他身死以后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太祖的统一对象是腐蚀、崩溃的元封建统治，但张居正却不想把腐蚀、崩溃的明封建统治做他的革新对象；他想让明神宗再造个明太祖的统治局面，但开明

的言官们却要求他开放言路。张居正所支持的既然是当时封建统治的原有局势，因此，他不能不和当时开明力量造成对立形势；明神宗既然是当时腐朽政治所派生的一位君主，张居正久揽政权，他们间的总矛盾就终于爆发，张居正就因此倒下来了。

继张居正做宰相的是申时行、王锡爵一类人物，这些人都是善于逢迎的老官僚，有的是张居正的短处，却没有张居正的长处。他们的政治设施既只是逢迎取巧，更引导明神宗走向腐朽的路，他们把持政权，阻塞言路却又和张居正执政时代的作风一样。张居正和当时的开明力量既造成对立形势，就不能不引用私党来排除异己；他们却继承了这个传统来维持个人政权，再借助这些人贪赃进贿，营私舞弊，就因此加深了明朝封建统治的腐蚀崩溃，就因此更不为开明的朝士大夫所容。

张居正的政治主张虽不免和时代车轮背驰，但他却有他的政治主张和他的政治抱负。他为了要施展他的抱负，才不愿放弃他取到手的政权，并不顾一切地排除异己来延缓他政权的崩溃。申时行、王锡爵一类人物却谈不到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抱负，他们借政权来投机取巧，把政权看成是私囊里的东西；他们没有政治设施，对国计民生都只是因循敷衍，对当时边患纯主和款，对全国灾荒漠不关心，对矿税扰民依违两可。他们也一样排斥异己，但主要是权利的争夺，谈不到政见上的同或不同；也一样引用私人，却纯然是培植自己私党来和别人争权夺利。

因此，就张居正和反张的在朝士大夫说，还能够从政见的不同分出个是非、邪正；从申、王到沈一贯继起执政，党同伐异就渐和政见无关，内阁更迭所争的只是权利，做官的人也大都此依彼附，幸进谄随。这时候，在朝的正人已日见减少，在野的清议

就日见高张，明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崩溃已开始进展到不可收拾的最后阶段。沈一贯所培植的浙党小人为了作最后挣扎，就联合昆、宣、齐、楚等小人党，不择任何手段，对在野的东林党人进行险恶攻击。当时东林党人斥小人党为小人，小人党斥东林党人为小人，就在这邪正相攻，纷如聚讼的政治情势下，汤显祖在临川隐居，结束了他的一生。

汤显祖在二十八岁第二次进京会试的那年，就尝到了仕途的苦味。这一年是张居正大权独揽已达到最高峰的一年，也就是张居正和言官们的矛盾总爆发的一年。前一年，刘台因劾张革职。到本年，张居正夺情事起，他那独裁政治家的面孔，明摆在这富有正义感的书生面前，汤显祖对未来的政治生涯就不能不望而却步。汤显祖一面在发展他孤介的气质和高隐的情调，但一面却怀抱着浪漫的、空洞的政治理想。他曾在诗里说：“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玉茗堂诗》之三，《三十七》）他认为中国的事可由他轻而易举地大做一手，他认为为做完了这一手再退隐也不为迟罢。因此，他在三十四岁中进士后，就选择了南京太常寺博士的闲职做自己的退步，并作为自己的前进基础。但当时执政如申时行、王锡爵一类人物，比起张居正来却一蟹不如一蟹，因此，他只好再选择礼部祠祭司主事做他的第二退步。这时候，他很有闲时安心读书，但是他的心里却藏有忍不住的愤懑。他眼见追名逐利的一群人物，真好像漆黑的一群蝼蚁，如果和这群人长此纷扰，倒不如走“永割攀缘”的出世的路。

但现实却摆在汤显祖的眼前。申时行对万历十五年到十七年（1587—1589）的全国性大灾荒熟视无睹，直到万历十九年才派遣杨文举到江南经理荒政。杨到江南后却无钱不贪，把地方灾情全都放在脑后。万历十八年，洮州失事，申时行和边将通

贿，对边将的欺蔽进行庇护，而且他力主和款，只图苟安一时，却无意留心战守。十九年偶因小捷，边将大报战功，申时行却引以自居，并在他考绩的敕语里大书一笔。在全国性的大灾荒里，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救死不暇，朝臣们却争论着科场弊端。申时行的儿子是当时弊端中的人物之一，因此，申时行就成了科场弊端的庇护人了。十八年洮河失事，万国钦劾申时行主和畏敌，通贿护私，即击中了申时行的要害。十九年又值星变，言官们更大有弹劾执政的机缘。申时行借神宗的谕旨反责科道诸臣，原企图用高压达到他钳制言论的阴谋，却不防汤显祖针对着神宗的谕旨，给申时行和他的私人们当头打了一棒。这时候，汤显祖面对现实，激起了难以压抑的义愤。他那种“永割攀缘”的消极情调刚发展到最高峰，却早被现实的光芒引向了恰好相反的斗争的道路。由于他难以压抑的义愤，发出了震惊一时的论劾辅臣、科臣的有名的弹章。

汤显祖虽因这本弹章被贬为徐闻县典史，但申时行和他的私人杨文举、胡汝宁等竟因为汤的一击，完结了他们的政治生命，其他的人也不敢露出鳞爪，这弹章的威力是非常大的。汤显祖却反因被贬，漫游了广东的名胜，开拓了他诗人的胸襟。汤显祖到徐闻不久，就升任了遂昌县知县。他在遂昌施政却也是很可称道的。他营建了学舍和射堂，替遂昌县的文教设施打下了初步基础；他进行诛虎、缉盗，加强了遂昌县的治安保卫工作，并和勾结“隐民”的“富人”、“势人”展开了正面的斗争；他时常和当地读书人讲学问字，并和当地老百姓闲话农桑，陈说“天性大义”；他是个亲民的官，并能因“百姓所欲”安排他施政的方针；他能廉洁自律，并能够爱惜百姓。等到他施政三年，诸事就理以后，又敢于遣囚、纵囚，在深得民心的保障下，做了两件其他地方官吏所不敢做的事。他在封建王朝是属于循吏一类的官。

他做官是为封建统治服务，这是无可疑问的。他的文教设施是为了昌明礼教，他曾替封建统治者对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也就是替封建统治者做了一些好事。

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却有加无已地尽做坏事。万历二十四年（1596），也就是汤显祖遭囚、纵囚的那一年，明神宗借矿税搜刮民财，派遣宦官多人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开矿。宦官们招集地方无赖，到处骚扰，使民间贫富都不能自安。在这年的十二月，宦官曹金到浙江，汤显祖这亲民的官，在政务刚就理的时候，偏遇见这一件扰民的事。明朝封建统治既愈陷愈深地走向它腐蚀、崩溃的路，汤显祖要想在这种情势下面，替封建统治者做多少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自然就是很难的了。

当时首相赵志皋老悖柔懦，在次相张位削藉以后，内阁实权都落在工于迎合、好同恶异的沈一贯的手里，小人党在朝廷开始抬起头来。顾宪成在二泉书院讲学，东林党在民间也树立了初步的基础。汤显祖是申时行、王锡爵所惧怕的正义人物。张位是汤显祖的老师，沈一贯因排挤张位才取得内阁实权，对汤显祖当然更不相容。因此，汤在他诗里说：“心知故相嗔还得，直是当今丞相嗔。”（《玉茗堂诗·漫书所闻答吴观察四首之三》）他心知在这种山雨欲来的黑暗政治情势下面，已没有他施展政治抱负的任何可能性了。因此，他决计投劾回家，丢官不做。也就在他投劾回家的第三年，适当吏部外察，汤显祖这亲民的官却竟被主持察政的人用“不羁”两字作为考语，追论削籍了。

从汤显祖追论削籍以后，沈一贯和他的党徒们对在朝的正人君子和社会的开明势力展开了全面进攻。他们对正人君子、开明势力不断进行迫害，造成了攻禅逐僧事件、楚府事件、妖书事件，李贽和达观既先后殉难，郭正域也几濒于危。这时候，明朝

政治黑暗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一方面，顾宪成在东林书院已树起了论政讲学的斗争旗帜，李贽和达观的思想启蒙精神更笼罩一切开明人士，不能不使代表封建势力的正统理学望而生畏。一方面是正人和邪党，开明和黑暗已接近主力战斗，沈一贯和浙党小人要巩固本身的政治势力，就不能不面对新的压力作顽强的抵抗，并企图对在朝、在野的一切开明势力全部加以扑灭。

李贽和达观是汤显祖所尊敬的人。汤在他追论削籍以后，又遭遇他两人因政治倾陷先后殉难的事，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许多冤苦。这时候，在朝的士大夫们都是些此依彼附，幸进诡随的人。汤显祖说：“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僂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不然，则如海母目虾，随人浮沉，都无眉目，方称盛德”。

（《玉茗堂尺牍·答马心易》）就指的是这一类人物。沈一贯所培植的浙党小人更不断兴风作浪，使汤在这种黑暗的政治情势下面随时都放心不开。他随时被一种低沉的政治情调苦恼着，使他无法自解，他自称这种情调是一种“无服之丧，无声之哭”。因此，他就自号“茧翁”。他很想咬穿这个茧子，飞向光明天地，但他却自认为无力咬穿这个茧子，就只好在这个茧里乾到死了。

在达观殉难的第二年，顾宪成就开始在东林书院讲学，这件事是正人和邪党，开明和黑暗的主力战斗的良好的开端。汤显祖刚离开政治生涯，由于他一意隐居，对这个新兴的战斗力量却不曾作充分的正确估计。东林党人大多是汤显祖的好朋友，但在野开明朝臣互通声气。被小人党说成是“遥制朝权”的东林党人于中甫到了南昌，汤显祖却避不和他见面。丁元荐是东林党的急先锋，他曾上疏揭发浙党小人和昆，宣两党的狼狈为奸，因被小人党围攻去职，但汤在给他的信里却说：“吾辈得白头为佳，无须过量”。（《玉茗堂尺牍·与丁长孺》）汤和东林党人是不会有